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特色文化研究

宁波地名文化

NINGBO DIMING WENHUA

徐雪英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地名文化

NINGBO DIMING WENHUA

徐雪英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地名文化 / 徐雪英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8-13381-4

I. ①宁… II. ①徐… III. ①地名—文化—宁波市
IV. ①K92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537 号

宁波地名文化

徐雪英 著

责任编辑 曾 熙 zxpeggy@zju. edu. cn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381-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序

地名看似平常,却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名是历史,更是文化,地名的语音语义以及构词,总是与区域的地理地形、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地名是文化的承载,凝聚着地域的民情民风 and 难以释怀的乡土情感。

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追溯起来,有两个时间节点对宁波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宁波单独设立地方行政建制,以明州称之;一是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从小溪(今鄞江镇)迁至三江口。它标志着宁波城的正式确立。至此,宁波从疏散的低丘聚落向繁复紧密的城市生活方式演进,并以城市为核心,逐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街巷里弄,散落周边的乡镇村落,随处可见的寺庙庵堂,以及连接民众集居片区的渡口、码头与桥梁。它们沧海桑田,留下难以计数的各种各样的地名。这些地名,在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或延续或更替或消失,见证宁波城的发展和变迁,动荡与繁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我们研究宁波历史文化遗产的实证性的依据。

所以,当徐雪英承接宁波市的文化项目“宁波地名文化研究”时,心里着实地为她感到高兴。一方面如上所述,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是值得发掘的研究富矿;另一方面,在此前较长时间里,我时常在宁波几家报刊上,看到她写的关于宁波地名文化的文章,她努力且具才气,可知宁波地名文化就是她的兴趣之所在。当研究项目颇具价值,又与研究者的兴趣相契合时,很是令人欣喜。至少,原本青灯黄卷、既耗时又费心的努力,不再是一

桩乏味的苦差事。当然,我也替她担心,这项研究的挑战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首先,地名文化是一门多学科交集的研究,以书稿看,作者的梳理是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多个层面切入,涉及区域的地形地貌、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活动、语言语音、民风习俗、民众的观念、心理甚至生存状态,这方方面面,需要作者有阔大的学术背景与扎实的学问根底。

其次,地名和地名相关的文化及其沿革与变迁,大都记载在史籍方志之中。宁波人记载自己的地域历史始于唐或北宋初,《明州图志》大约就是最早的一部有名可考的地方志,修于唐或北宋年间,可惜该志已经失传,仅在《浙江方志考》记载有它的名录。此后,宁波历代公私编纂地方史志众多,其中为学界推崇的当数《宋元四明六志》,即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及至正《四明续志》。我们知道,撰写一本地名文化的著作,反复阅读地方史志,搜寻一手的原始资料,是一项必备的基本修炼。对于一个非历史专业背景的研究者,顺便说一句,在大学里,徐雪英主修汉语言文学,且不说数量众多的史籍方志,就是《宋元四明六志》,开卷阅读已经构成了学养与心理的双重挑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关于宁波地名文化的专门研究,涉足者寥寥。从历史上看,有关宁波地名的来历与沿革,多半是以资料文献的性质散落在史籍方志中,也有少量与地名相关的传说故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于民间,比如镇海文溪传说是越国大夫文种故里而得名。但类似于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那样的著作,从地名学的专门眼光,对政区地理沿革、地名渊源和山川险要之名称进行辨析与阐释的,基本没有。最近20年,宁波的地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成果有两类:一是宁波下属的各县(市、区)的相关部门陆续出版了不少地名志,如《鄞州地名志》、《镇海区地名志》、《北仑区地名志》、《象山县地名志》等。这类地名志汇集各区域内现有地名的来历与沿革,记述有关地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民风民俗等信息,具有资料汇集的特征,是宁波地名研究重要的基础性的收获,但受志书体例的限制,上述成果没有对地名文化展开深入的开掘。一是有文化单位和学者涉猎地名研究,有专著也有论文,较有影响的如《甬城街巷》、《宁波地名诗》、《宁波地名的文化意义阐释》、《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宁波街巷地名为例》等,这类成果在地名文化研究的某个方面,具有开拓性的

意义,并达到一定的深度,但是,全面的、整体性的宁波地名文化研究依旧是个空白。

可以这样认为,徐雪英面临的难题,正是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宁波地名文化已经敞开了巨大的研究空间,但攀登的道路崎岖,没有拾级而上的台阶,徐雪英的研究犹如这台阶的修建,是基础性,更具有开拓开创性的意义。

如今,当20余万字的书稿搁在我的书桌上时,所有的挑战与写作的艰难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我不能不感慨:她的毅力、韧性和才情,让人刮目相看。说实在的,我与徐雪英交往不多,她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由于系统及工作性质上的关系,我们在一些会议和活动中时常有些交往与交流。基层学校的工作繁忙、杂乱、琐碎,没有超常的EQ指数,是难以应付自如的。关于她的职场状态,我知之甚少,不便妄加评论,但是她对工作对专业对研究,洋溢着一种感染人的热情,最为同行所赞赏。前几年,我接受了《宁波历史文化读本》的撰写任务,得知徐雪英在地名文化研究的状况,便邀请她参与书中“宁波街巷文化”章节的撰写。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由于诸事纷繁,读本的撰写延续了两年多时间,而徐雪英那头却意想不到地顺畅:她最晚参与,却早早提交了书稿,并顺利地通过专家的审读。这固然得益于她在宁波地名文化研究上的积累,也和她的态度相关。印象中,无论是章节的框架布局、文字修改,还是陪摄影师四处拍摄相关的照片,徐雪英抱尽善尽美的心态,没有抱怨,不怕费时费心,努力工作,尽可能达到专家们提出的要求。

追求完善是徐雪英飞翔的翅膀,它贯穿也彰显于《宁波地名文化研究》的书稿里。

比如在梳理地名的命名理据时,因为涉及相关的地理、历史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徐雪英行文谨慎,注重表述的完备性和材料引用的出处。看得出作者是下了工夫,很有以勤补拙的意味。宁波地貌类型很多,有山地、丘陵、盆地、平原、滩涂、港湾、岛屿等,其中山体根据形貌不同又分别称为“山、岗、峰、尖、林、陡”,宁波山体类通名中以“山”为最多,书中列举了阿育王山、妙山、五磊山、九峰山、凤凰山、福泉山、达蓬山、跃龙山、雁苍山、梁皇山、雷锋山、杜鹃山、四明山、太白山、松兰山、招宝山之后,作者特别指出,如果到宁波地名网(www.nbdm.gov.cn)“地名查询”的栏目中查询,以“山”为关键词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能够搜索到64页,约1600多个地名。

又如探讨余姚县名的来历,徐雪英先从《山海经》的说法入手,说是余姚与句章之间有座句余山,二县分别取其一字命名,余姚取句余山之“余”字,与北边姚水之“姚”字,合为余姚。接着作者引入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见解。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指出,余姚得名和盐有关,在古籍《越绝书》里,有“越人谓盐曰余”之记载。两相比较,徐雪英认可李慈铭的说法。余姚长期是浙江最大的产盐区,古文献记载,其主要产地为庵东(新中国成立后归属慈溪),素有“浙江盐都”之美誉。至于为何称“姚”,很多人认为与舜的传说有关,舜姓姚,故曰余姚。整个余姚县名的辨析过程,作者力求言之有据,引经据典,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当论及宁波地名的词汇特征、构词方法、音形义特点以及修辞分析,徐雪英的笔墨舒展而灵动,毫无疑问,这些话题当属她的专业范畴。比如地名的语音特征,作者从古音娓娓道来。宁波方言蕴涵众多的古汉语成分,有29个声母,48个韵母,而且这48个韵母中还有m、ŋ、n这三个自成音节的辅音韵母。普通话是四个调值,宁波方言则有7个单字调值,其中阴入、阳入就是古汉语的入声声值的遗存,它以塞音音节收尾,发音短而急促(如宁波话中的白、七、曲),有时还带辅音韵尾。这种古音特征对部分宁波地名的音节构成、平仄搭配,产生重要影响,形成宁波地名的语音特征。作者有理有据的探讨,颇具信服力。

宁波地名文化内涵的发掘,也是书稿中较为出彩的章节。比如分析地名中的某通名,作者往往从本义到引申义,再到地名中的运用,并列举同通名的宁波地名,展开具体分析,以揭示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书稿中说到“坊”,先是说它作为通名,有三层含义:一是本义为里巷,古代实行里坊制,把城邑划分为若干区,通称为坊,多用于地名;二是牌坊最早立于里巷,故“坊”又引申为牌坊;第三,古代小手工业者的作坊多在里巷内,“坊”又指小手工业的工作场所。接着作者指出,在宁波古代典籍中,能够找到许多带“坊”字地名,如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三里记录宁波当时划分51坊的详情,其中东南厢就分14坊,有锦勋坊、握兰坊、连桂坊、重桂坊、兴廉坊、吉祥坊、锦乐坊、迪教坊、积善坊、状元坊、清润坊、余庆坊、进贤坊、康乐坊等。但這些古坊名遗存很少,现宁波地名中的“坊”多半为牌坊之义,如宁波江东的彩虹坊。彩虹坊原名彩虹牌坊,建于1881年,是清朝政府为表彰节孝妇包氏而立。因这一带曾有彩虹桥,后又辟为彩虹路,所以称该牌坊为彩虹坊。彩虹坊也是宁波城区内现存最完整的石牌坊。这一段关于“坊”表述,是较

有代表性的，作者在掌握较为丰富的地名资料后的那种从古到今、如数家珍般的从容，是书稿重要的亮点。

当然，毋庸讳言，书稿也存在着欠缺之处。简单地说，构架设置上有值得推敲的余地，在不同章节中，部分内容疑似重复出现。另外，书稿完成似乎有些仓促，文字表述也略显粗糙。

以上便是我对作者书稿的真实感受。

是以为序！

梁旭东

2014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地名研究概述	(1)
第一节 地名的定义、特点和功能	(1)
第二节 地名的构词方式和音形义特点	(4)
第三节 地名中的文化因素和研究现状	(7)
第四节 宁波地理历史及宁波地名研究现状	(11)
第二章 宁波地名的语言分析	(18)
第一节 宁波地名的语音特点	(18)
第二节 宁波地名的词汇特点	(24)
第三节 宁波地名的词法特点	(43)
第四节 宁波地名的修辞分析	(46)
第三章 宁波地名的命名理据	(51)
第一节 宁波地名通名的命名理据	(52)
第二节 宁波地名专名的命名理据	(92)
第四章 宁波地名的文化内涵	(122)
第一节 地名反映宁波古代历史	(122)
第二节 地名反映宁波地理状况	(132)
第三节 地名反映宁波乡土文化	(135)
第四节 地名反映宁波街巷文化	(140)

第五章 宁波地名遗产的保护	(150)
第一节 老地名正在消失	(150)
第二节 新地名佳名难求	(165)
第三节 古为今用保护地名遗产	(181)
附录一 宁波老地名的故事传说	(190)
桃花古渡的传说	(190)
柳庄巷里说柳庄	(192)
战船街	(193)
宝幢的历史与传说	(194)
百丈街的传说	(197)
遗落在民谣中的行业地名	(199)
海曙桥事	(202)
海曙专业街漫谈	(214)
附录二 宁波相关地名管理办法及规划	(220)
宁波市地名管理办法(2003-01-08)	(220)
宁波市城市地名总体规划	(226)
主要参考文献	(231)
索 引	(234)
后 记	(236)

第一章 地名研究概述

第一节 地名的定义、特点和功能

一、地名的定义

地名起源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原始人类为了记住他们心目中重要的地方,如那些有果实、水源之地,便给它们做标识以便于记忆,这就是地名的雏形,并最后渐渐演变成地名。所以地名的起源,要远早于文字。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人类靠口口相传的方式使用地名。文字产生后,这些口语地名就被部分记录下来并得以传播,流传后世。

在现有史籍中,最早出现“地名”一词的是《周礼》。《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其《夏官·司马第四》篇章里记载:“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但这里所谓的“地名”和我们现在的地名概念有所区别,只是指丘陵、坟衍、原隰等这些名称,像“山林之名”、“川泽之名”等都不在这个“地名”概念范围之内。可见,早期“地名”内涵没像现在这样丰富,直到东汉、两晋时,“地名”内涵才和当今基本相似。

那么到底什么是地名呢?关于地名的定义,当今学术界在讨论中,存在一定的认识差距,尚未统一,争议颇多。著名地理学家曾世英对地名的定义较为被认可,他认为:“作为泛称,地名就是地方的名称;作为专指,每

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这个地名定义较为全面、较好地揭示了地名的实质：首先，地名不是本身自有或天然就有的，而是人们赋予的，这种赋予经历了从当地少数人使用到逐渐为众人认可再至被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历史发展过程；其次，地名并非单纯指称地理实体，还具有指代方位功能，能够指称特定地理实体所在的区域，即地理方位；最后，还揭示出地名的符号属性，认为地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也具有一般词语的音、形、义等语言要素。

二、地名的特点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信息的载体，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地名是语言、地理、历史等多侧面的综合体，所以具有以下特点。

1. 社会性

地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虽然最初往往是由少数人提出的，但只有经过社会上大多数人公认，即约定俗成后，才能交流使用。它的命名、更名、发展、演变始终受着社会各方面的制约，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2. 时代性

地名具有时代性。它的命名、改名通常受时代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社会经济以及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反映出当时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3. 地域性

地名是地方的名称。地名的产生、形成及使用与人们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有紧密联系，一般局限于一定的区域，常受区域内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历史传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影响和约束，具有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4. 指代性

地名是有指代意义的。一个地名不仅能代表它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

性质和类别,还能代表这个地理实体具体的方位和范围,以便和其他地理实体区别开来。指代性是地名被传播、沿用的基础。

5. 稳定性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些地名也在相应发生变化。但由于作为地方指称而被长期传播使用后,和其他词语相比,地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多数地名如自然地理名称、聚落县市名称等基本稳定。

三、地名的功能

作为地方的名称,地名表面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十分平常,其实人类的社会活动离不开地名,地名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功能。

1.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地名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常用的名词,它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处不在,无人不用。离开地名,人们的活动空间将无法得以确定。没有地名,就没有出发地和目的地,人们将无法进行具体有效的生产交往,所以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2. 地名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工具

国家一般都是通过划分行政区域,设置相应地方政权来管理国家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地名为前提和载体,离开地名,行政区域划分就难以为继。行政区域名称是地名的一部分,是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集中统一的工具。

3. 地名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手段

地名是确认领土主权归属的重要标志。根据“名从主人”的国际惯例,一个地方的地名是由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命名的,它的由来含义是什么,是确定这个地方主权归属的重要标识。因为地名的命名总与当地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民族风俗等密切相关,是当地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因此各个国家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把本国对边界地理

实体的命名作为拥有主权的有力证据来使用。

4. 地名是历史发展演变的记录者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名忠实地记录着人类社会历史及自然演变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古老的地名,更是沉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通过地名,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迁徙踪迹,可以研究一个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甚至还可以研究一个地方古代地貌、考古遗存等,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活化石”。

5. 地名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地名是社会现象,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名与文化共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地名充当着运载、传播的工具。人类文化从古到今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由于岁月的流逝,许多古文化内容已经湮灭,但在地名中仍能一窥它们的踪迹。所以牛汝辰先生说:“地名是文化的镜像。”它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能反映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图腾宗教、道德观念、理想愿望、社会心理等等,能较好地反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总之,地名具有诸多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功能。在现代,地名是社会信息的载体,信息的传输和交流都要通过地名这个载体来完成。它不仅与人们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更是国家行政管理 and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建设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信息资源,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地名的构词方式和音形义特点

地名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是人类认识和借以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具有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特征,是属于语言符号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地名词和其他词语一样,有一定的结构方式,有单纯词、合成词及词组等。

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活动范围很小,认识客观事物能力有限,单音节词就可以描述清楚事物,所以单音节词是那时的主流用词。

因此最早的地名命名也多以单音节词为主。《说文解字》收了 9353 个单音节字,单音节地名词就有近 400 之多,如“江”、“河”、“邹”、“邑”等。当然也有少量双音节单纯地名词,而且多为连绵词,如“会稽”、“盱眙”、“龟兹”等。现代遗存的单音节地名以一些历史名城、省份的别称为主,如“晋”(山西)、“浙”(浙江)、“甬”(宁波)等等。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接触到的客观事物越来越复杂,单音节词已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词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及多音节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汉语的双音节复合词不断增多,复合词地名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聚落也呈现复杂化趋势,大量由专名和通名组合而成的词组地名开始不断涌现。

合成词地名及词组地名以双音节和三音节地名为最多,如“北京”、“洞庭湖”等,也有如“大兴安岭”、“大小纱帽胡同”等不少其他多音节地名。合成词地名及词组地名和一般词语一样,主要有偏正式、附加式、联合式,也有一些方位结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但几乎没有介词结构、“的”结构、同位结构等构词方式。

作为一种也由社会“约定”而“俗成”的语言符号,地名具有一般语言的音形义特点,一般都有一定的读音、含义,也有一定的书写方式。但地名毕竟是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是语言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别,所以在音形义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和一般词语相比,地名的读音比较复杂。因为汉语中的地名大多有几千年的历史,命名时代的读音和现代读音有了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地名具有稳定性,许多读音是口耳相传,世代相承,所以往往能保留早期命名时代的读音,使现代地名呈现出古读多、异读多、方言音多、生僻音多的特点来。如福建厦门的“厦”不读 shà,而读 xià;浙江台州的“台”读 tāi,而不读 tái。

在字形上,地名词语同样呈现古字多、异体字多、方言字多、生僻字多的特点。我国古籍中记载了大量地名,这些地名有的已经变更或消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世代相传,沿用至今。孙东虎先生在《地名史源学概论》里考证说,仅在《史记》上记载且至今沿用的“活着”的古老地名就有 334 条之多,如果再加上其他古籍里记载的,现在还“活着”的古老地名的数量一定十分庞大。福建的简称“闽”就是一个古老地名。《说文解字》解释说:“闽,东南越,蛇种。”福建古代居民崇拜蛇,以蛇为图腾。郭锦桴教授推测说,“闽”可能是当地古部落的名称,相沿既久,便演变成当地的地名。

同时,地名中还存在大量异体字,如云南省潞江县的“潞”有潞、澄两种写法,河南商邱的“邱”也有邱、丘两种写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出台《异体字整理表》来实现“书同文”政策,使地名中的异体字得以规范清理。但由于汉字的规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关于异体字的认定标准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修正,所以现代地名中的异体字现象仍然存在。而且事实上部分地名异体字也的确难以替代,如果简单替代就极易模糊、改变甚至失去该地名的原意。如江苏常熟的淼泉镇以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只有“淼”能确切表达该地“多水”特征,如改用“渺”,不但难以体现“多水”,还可能被误解为“缺水”呢。

因为很多地名一开始是用方言命名的,地名又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所以现代地名中的方言色彩仍旧浓郁。尤其是那些自然村落、山水地理地貌的地名更是如此。如“汇”,“汇”是吴方言词语,在吴方言地区指河汉交汇处,常被用作村落名。如上海松江的毛家汇,浙江平阳的潘家汇、宁波的邵家汇等。

另外,由于各方言地区有自己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在起初用字时各自造了一批独特的用字,流传至今,大多是较不容易为大家所熟悉的生僻字,如浙江鄞州的“鄞”(音 yín),江苏角直的“角”(音 lù)等,都不太容易为外地人所认识和理解。

和一般词语一样,地名词语的意义也由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所构成。地名基本义所揭示的是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位置、范围和类型等,它是地名中最稳定的中心意义,一般保持不变。附加义则包括隐含于地名中的历史来源和演变知识,可以来源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景观,也可以来源于当地经济文化生活、历史人物或事件,反映出人们对这个地理实体的认识、看法及意愿等。如“杭州”,用于指称杭州市这块地域时,就是基本义。指它“简称杭”、“曾为南宋行宫,现为浙江省省会”、“古时曾称临安、钱塘、武林等”这些内容时,就是从历史沿革、社会事件角度论述它的附加义。

总之,地名词语具有一般词语的特征,但又和一般词语在音形义等方面有所区别。李如龙教授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中明确指出:“只有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建立科学的地名学。”同时,通过地名的研究,也有助于语言的研究。地名中古音的保留、语言的接触及特殊的构词对语言学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所以有人感叹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

第三节 地名中的文化因素和研究现状

一、地名中的文化因素

语言是一种文化形态。正常的人都有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但这种能力和行为常常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文化就是其中一种因素。“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沈锡伦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涉及语言表达中的文化选择原则。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一文论述道:“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语言运用的全过程,影响到语言单位的选定形式。进一步说,文化因素还会影响到人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汉语从形式到表达都带上了浓厚的人文因素。”

作为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地名同样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初人们为什么这样命名而不是那样命名,同样也涉及语言表达中的文化选择原则。所以沈锡伦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中进一步论述:“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它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透过地名的宏观文化考察,人们能获得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地名研究能重现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面貌。”^①

“文化”是复合词,甲骨文中的“文”像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后引申为各色交错的纹理,进而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初指事物形态、性质的改变,后引申为教行、迁善等社会意义。“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刘向《说苑》一书中,该书《指武》篇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显然,这里的“文化”只是一种治理手段,和现在我们常谓的“文化”有所不同。

现代意义的文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狭义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广义文化不但包括精神产品,还包括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成果,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就像田广林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一书中阐述的那样:

^① 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